

# 论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性别平等中的作用

## ——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文本解析

何睿祺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摘要

本文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文本基础, 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 追溯家务劳动从公共走向私人的历史变迁, 并探讨家务劳动社会化在实现性别平等中的关键地位与现实意义。恩格斯提出实现性别平等的三大先决条件——女性回归公共劳动、依靠现代大工业、家务劳动社会化, 其中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是独立条件, 更是实现前两个条件的关键助推力量。从“两种生产”理论视角看,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对人类自身生产的重新组织, 能有效平衡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矛盾, 为建立新型性别关系奠定物质基础。

### 关键词

家务劳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 性别平等, 恩格斯

# On the Role of the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in Gender Equality

##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uiqi He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3,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 Abstract

Taking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as its textu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domestic labour from the public to the private sphe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lassical Marxist gender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pivotal rol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Engels proposed three prerequisites for gender equality: the return of women to public labour, reliance on modern large-scale industry, and the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Among these, the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is not only an independent condition but also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realising the first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y, the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represents a reorganisation of human self-production, capable of effectively balanc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lay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new gender relations.

## Keywords

Socialisation of Domestic Labour, Marxism, Gender Equality, Engel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家务劳动地位的动态变迁

家务劳动的历史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在原始社会以母系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阶段，女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尊重和地位，这是由于当时主要由女性承担大部分劳动任务，为社群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构成了早期对偶社会的主要特点，赋予女性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随着社会发展，“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 ([1], p. 50) 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在男子劳动领域内出现了剩余产品，形成财富的积累，这就加强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1], p. 72)。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比是恩格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形象化概括，其后被部分学者批评为将性别压迫完全还原为经济关系，简化了性别压迫的独特性。

家庭责任的隐藏与私有制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恩格斯的研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以前，在古老的共和制家庭经济里，女性的管理职责如同男性的食品供应一样，是一种公众需要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男女间的劳动分配是由自然的生理差异来决定的。男人去打猎或钓鱼，寻找可食用的材料，女人则承担起照顾孩子和维持家庭的任务。由于男人的狩猎成果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那个时候的家庭主要依赖女人的工作，她们受到高度尊敬并占据着领导位置。总的来说，那时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明确划分，男女的社会角色相当平衡。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家庭工作的属性。随着生产的提高，产生了大量多余的产品，男性逐渐掌握了私人资产。原本简单的人际关系转变成了经济联系，整个社会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1], pp. 62-63)

## 2. 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性别平等三大先决条件中处于关键地位

私有制的成熟带来对私有制的批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尝试提出性别平等的三个先决条件，而家务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再次公共化的趋势。恩格斯提出的三个先决条件中，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1], p. 72)，以使妇女经济

上不再依赖于男子；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1], p. 160)；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 p. 160)。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1], p. 71)，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能够助推妇女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找到平衡并逐渐实现自我解放。这三个条件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只有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性别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属于第三个先决条件，然而，在第一个条件与第二个条件中，家务劳动社会化实际上起到潜在助推作用。在妇女回到公共劳动的长期进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妇女在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平衡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这是因为，妇女要真正参与社会生产，就必须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束缚，而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将原本由女性独立完成的无偿工作转移到公共经济领域，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女性的家务负担，更关键的是为女性提供更多参与社会生产的时间和机遇。

家务劳动被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部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自身的生产主要表现为家务劳动和生育责任，这些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且往往是无偿的。这种状况使妇女在双重负担下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要参与社会生产获取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育责任。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指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私人无偿劳动转移到公共经济中，由社会共同承担，逐渐走向社会化，这一思想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平衡发展[2]。家务劳动社会化通过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劳动纳入社会生产的范畴，使妇女能够在两种生产的统一中实现自身的解放，从而更好地平衡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而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需要妇女也参与进公共劳动，提高社会生产力，让工业结构更加平衡高效。随着经济的市场扩张和商贸活动的飞速进步及机械制造的大规模应用，对于劳工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需要大量女性的加入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女子开始离开私人的家庭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并逐步使家庭的日常工作脱离了私人范围从而推动着家用事务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社会的进一步分工程度提高，而且能够增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使得原本属于私人的家务转变成了公开领域的职业岗位进而创造出更多的职位机会；其次，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有效地解脱那些长期被困于沉闷的家庭琐事中的女性，使其有机会投身各类商务场合来实现自我增值的目的。因此，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是第三个先决条件的体现，更是实现前两个先决条件的重要助推力量。在恩格斯这里，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第三个条件进行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

### 3. 后世学者对恩格斯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在市场化的社会里，要对性别压迫展开批判，批判的矛头要对准社会结构，对结构性压迫展开批判。”[3]恩格斯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性别不平等的物质根源奠定了基础，但后世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批判性发展，拓展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力。莉丝·沃格尔认为，“《起源》代表了恩格斯提出含蓄批评的一种尝试”[4]，并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1983)中，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系统化重构。沃格尔认为，恩格斯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家务劳动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关键作用，但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家务劳动的组织形式存在差异。她强调家务劳动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其组织方式受到阶级、种族和国家政策的共同塑造。这一发展补充了恩格斯框架中对阶级内部性别差异关注不足的问题。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则从更激进的立场出发，在《凯列班与女巫》(2004)中指出，恩格斯所描述的从母系社会向父权制的过渡，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尤其是对巫术迫害

和生育强制——密不可分，恩格斯将性别压迫主要归因于私有制的兴起，但忽视了父权制本身作为一套独立于经济制度的权力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她主张，真正的性别平等不能仅依靠生产方式的变革，还需要对照料劳动(care labour)的价值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认可[5]。

#### 4.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现实意义

在原始社会，“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受着劳动发展阶段和家庭发展阶段的双重制约。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家庭模式也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在私有制社会中，物质资源的生产和人类的生产都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并无谁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二者的结合成为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人自身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仍然带来对女性身体的损伤以及对妇女参与公共劳动造成阻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自身的生产主要表现为家务劳动和生育责任，这些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且往往是无偿的。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妇女难以真正实现与男子的平等地位。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对于减轻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二者平衡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化的家务劳动不仅推动科技工具的进步和相关服务业的兴起，也能有效地降低家庭劳动压力并增加一定的社会财富。这对于改革传统的性别分配方式非常有益，女性可以获得更多时间去自由且全面地发展。从“两种生产”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务劳动社会化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两种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它通过将人类自身生产中的部分劳动社会化，使妇女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在两种生产的统一中实现自身的解放。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在社会的劳动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 p. 16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家庭工作的社会化水平能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这是一种让女性融入社会并获得自我解放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是通过发展家务服务行业，将部分家务劳动专业化、市场化；二是通过提供公共托儿、养老等服务，减轻妇女在照顾家庭成员方面的负担；三是通过推广现代化的家务劳动工具和技术，提高家务劳动的效率。妇女只有真正走出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才能最终实现两性平等。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其意义不仅在于减轻妇女的劳动负担，更在于通过改变两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建立新型的性别关系奠定物质基础。当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出现时，家庭的全部责任将会由整个社区承担起来，这意味着个人化的家庭会逐渐消失，而他们作为社会经济单元的功能也会随之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终将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和社会地位。

然而，在肯定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正视其潜在的负面问题。在家务劳动社会化中的突出体现是家务劳动的强劲需求与从业人员供给不足的矛盾[6]。首先是护理工作的商品化风险问题。当家务劳动被推向市场，原本由家庭成员基于情感和责任承担的照料工作转变为商品交易，可能导致护理质量的下降和照料关系的异化。其次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收益并非均等分配。中上层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市场化的家务服务来解放自身，而底层女性则可能成为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承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报酬。对此，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规避：一是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普惠化，将托幼、养老、家政等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避免其完全依赖市场定价；二是保障家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合理薪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防止其沦为新的被剥削群体；三是在推进社会化的同时，尊重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自主性，避免以“解放”之名强制改变个人选择。

#### 5. 结论

通过对《起源》的分析，可以窥见家务劳动从公共到私人的历史变迁，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性别平等

三大先决条件中处于关键地位，与妇女回到公共劳动、依靠现代大工业相互依存。从“两种生产”理论视角看，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对人类自身生产的重新组织和社会化，为建立新型性别关系奠定物质基础。当代社会，重视家务劳动社会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改变传统性别分工，推动妇女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2522729&from=Qikan\\_Search\\_Index](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02522729&from=Qikan_Search_Index)
- [3] 宋少鹏. “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4): 5-12+26.
- [4] 莉丝·沃格尔.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趋向统一的理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5]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凯列班与女巫: 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3.
- [6] 朱颖. 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11): 101-109.